

# 论乡土文化的变迁

胡映兰

**【提要】**中国传统的乡土文化是基于“守土”而形成的“乡、土、人”三者之间紧密的互动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伴随着中国农村改革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乡、土、人”三者之间开始“分崩离析”,即出现了“离土又离乡”的现象,这导致了乡土文化的变迁。乡土文化的变迁并不必然预示着乡土文化发展的危机,因为乡土文化的发展中孕育着创新的动力或机制,其中“三农”的现代化是乡土文化创新的外在动力,而“精神家园”的复兴是乡土文化创新的内在动力。乡土文化未来的发展走向无疑是在复兴或发展中国文化的“根”的基础上,注重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和中西文化的融合,以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自觉的目的。

**【关键词】**乡土文化 变迁 创新 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3)06-0094-08

乡土文化建设在中国农村现代化建设中是一个难以忽视的问题。伴随着现代化的转型,乡土文化未来发展的走向已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话题。不少学者不无担心地认为,乡土文化正逐渐被城市文化所侵蚀,甚至取代。如有学者指出的面临着严重的发展危机,“农民,这个被现代化工具宣判了死刑的阶层,正在等待寿终正寝的日子,对他们来说,土地的魅力已经完全丧失。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现钞。好在儿女们的肌肉并没有随古老的工具消失而消失。儿女们将肌肉能量转移到城市的水泥上去了。在最后的日子里,老农们显得十分平静。猪圈、牛栏拆除了,古老的农具变卖给收藏家了,锄头上的泥土已经清洗,高高地挂在了墙壁上。他们一边搓麻将,一边盼望着邮差的到来。”<sup>①</sup>更有学者认为,延续了几千年的乡土生机在现代中国日趋黯然,很多乡村大可以用“荒凉衰败”来形容。当然,对这些悲观看法也有学者质疑与反思。如孙庆忠认为:农业的凋敝以及乡村文化的蜕变都是危机的表象,是“离土”之“形”,而那些按照固有的惯性,存活在乡村的生活观念和价值体系乃是“乡土”之“神”,“形散”而“神聚”才是乡村文化的实质。<sup>②</sup>

在讨论如何保护乡土文化方面,有学者认为,通过

对名村的回访可以清晰地弄清楚乡土文化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演变脉络;而大多数学者主张通过对乡村进行旅游开发来对乡土文化进行保护。然而这些研究似乎都未能对乡土文化在现代化演变中进行创新的动力问题有着力研究。本文尝试就此问题进行探讨。

## 一、什么是乡土文化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指的是一个民族,或者群体,共有的生活方式与观念体系总称。”<sup>③</sup>它是共同生活的人群在长期的历史中逐渐形成起来的。<sup>④</sup>在费先生看来,中国文化是土地里长出来的,而且一直在土地的封锁线内徘徊;一方面国家的收入要

- ① 张柠:《土地的黄昏——中国乡村经验的微观权力分析》,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页。
- ② 孙庆忠:《离土中国与乡村文化的处境》,《江海学刊》2009年第4期。
- ③ 费孝通:《费孝通九十新语》,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页。
- ④ 费孝通:《费孝通九十新语》,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第145页。

靠田赋，另一方面农民的收入要靠农产，离开了土地就没法生存。<sup>①</sup> 由于农业家庭依靠土地为生，因此一旦获得土地就会稳定下来繁衍子嗣、传承家产，建构起跟土地直接相关的家族和村落文化。据此，可否对乡土文化作如下定义：乡土文化就是在乡村中的长期共同生活里所形成的乡村特有的、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与观念体系总称。

就乡土文化的范围而言，如果从表层结构、深层结构和意义结构来对文化进行分类，任何文化都将包括物质文化、规范文化和表现文化三层结构。同样，乡土文化也包括乡村物质文化、乡村规范文化和乡村表现文化等。乡村物质文化是指以乡村物质形式作为意义的符号载体，如通过乡村的自然风光和建筑风格以及农作方式等体现出来的文化。乡村规范文化在实体上由乡村的行为方式、制度或社群构成，一方面体现和贯彻了乡村社会的价值和规范，即文化的规则或深层结构；另一方面构成了某种集体意识或伦理意义，具体表现为乡村社会的习俗、舆论和文化观念等。乡村表现文化则是指通过乡村语言、图象、色彩、音调和姿势等体现出的文化，广义的不仅包括纯粹的表现文化，如民间文化，也包括物质表现文化和行为表现文化，具体如农耕文化、民俗节庆以及乡村传统工艺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费先生在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中，就把中国乡村的传统文化形象表述为“五谷文化”。“‘五谷文化’的特点之一，是人和土之间存在着特有的亲缘关系。”<sup>②</sup> 即从根本上表现为“守土”。费先生认为，归根结底，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自给自足特性与农业技术生产力的低下引发了传统乡村中农民与土地的特殊感情，“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sup>③</sup> 他同时认为：“我们的民族的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生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sup>④</sup> 正是这样一种乡土文化培育出了中国人极其强烈的归属于出生地的“乡土”习性。美国农业学家金（King）也认为中国人像是整个生态平衡里的一环，这个循环就是人和“土”的循环。

关于乡土文化的解读可以是多重的、见仁见智的。尽管有不少学者认为乡土文化存在很多弊端，如保守、封闭，特别是在现代化语境下，乡村文化成为与城市文化相对的代表落后、愚昧的一极，但是，对不同的文化主体而言，由于所处的文化图式不同，他所理解的能够满足其需求和欲望的资源，是必然存在明显差别的。<sup>⑤</sup> 正如费孝通先生在分析文字下乡时所说，不能只站在现代化的立场上来评价乡土社会，乡土性的才是决定乡村需求的根本，只有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现代化的东西才能“下乡”。<sup>⑥</sup> 如此，我们只有结合“乡、土、

人”三者的情境才能评价乡土文化存在的合理性。

## 二、乡土文化的变迁

反观自晚清以来的近一个半世纪的漫长历史，中国不仅出现了四次改造传统乡土社会的现代化运动，也出现了两次研究与实践“中国乡村社会建设和现代变迁”的高潮。有观点认为，“20世纪中西碰撞的结果，是由于工业化西方的强大威猛，使中国原有的身份认同发生了两个根本性变化，一是从政治上自我中心的‘天下——王朝’变为屈居一隅的‘民族国家’，另一个是从文化上无比优越的‘礼仪之邦’变成离散分化的‘乡土中国’。”<sup>⑦</sup>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以改革开放为实践理性的市场化与现代化进程，几乎是以西方现代文明的支配性逻辑来“同化”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道路。城市本位取代乡土本位的西化模式忽视了城乡二元对立的中国社会本土现实，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人地关系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与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导致的结果则是城市和乡村发展的非均衡性与不对称性——即现代工业城市的繁荣与传统乡村的衰败以及传统文化遗产被破坏等等。经验事实不免使人再次感受到梁漱溟先生“所以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的隐痛。<sup>⑧</sup> 于是，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成为新世纪的公共话语资源。李昌平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一度成为“三农问题”的代表性认识。人们越发深刻地认识到乡村和农业的发展不只是单纯的乡村问题，它既是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延伸，更是整个中国社会在全球化、城市化与现代化的世界趋势中的“民族社会工程”。<sup>⑨</sup> 但是，

- ① 费孝通：《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费孝通文集》第4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180页。
- ② 麻国庆：《社会结合和文化传统》，《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 ③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 ④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 ⑤ 马炜、陈庆德：《民族文化资本化》，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
- ⑥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 ⑦ 徐建新：《乡土中国的文化困境》，徐杰舜等主编《人类学与乡土中国》，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页。
- ⑧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页。
- ⑨ 夏艾青、钟璞：《论中国乡土文化热的中西语境》，《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遗憾的是,作为乡村文化的主体,农民没有能力参与知识精英的对话,更不理解“局外人”对农村文化的解读,只能用行动表述他们惯常的生活。对于大多数农民而言,那些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文化从生活中消失与那些源于城市的新的生活元素一样,仅仅是生活改善的一种形式而已。

与三农问题连接在一起的是被西方学者称为“内部流动”的移民问题。从农村去到各大城市务工的村民是这场历经时间长、规模也巨大的“移民”的主角,他们的行为及其所经历的过程对他们自身,以及他们来源的乡土都造成了或正或负的深刻影响。如研究中国移民问题的西方社会学者瑞雪·墨菲指出,一个围绕在这一问题上的核心主题之一,是针对其所带来的“不公、失衡”的局面。对于移民的来源地——乡村来说,失衡最关键表现在它反而愈加造成了乡村内部生活的紧张感,以及更重要的,从某种程度上它破坏了乡村经济的生存状态,而事实上巩固了乡村的落后局面。由此,乡土文化便更加失去了可维持或发展的机会和保障。紧张感主要来源于收入的不公带来的矛盾。比如在外务工的那部分人收入所得几乎一定是远高于留守在村子里的同龄人的,而他们最常有的做法是将在外务工所得的薪水用于回到老家后建屋盖房,这就使得他们变得更有资格成为婚配的对象,相对于那些一直留在村子里的村民来说,生存的局面便往往是富的越富穷的越穷。再比如,在外“见过世面”的村民往往更有可能打破长期在中国乡土文化的价值观念中牢牢盘踞的,关于对“中国传统家庭观”的遵守。他们往往更容易变得“独立”,独立于农村的家庭及原本生活的世界而由新的、现代的价值观念支配其生活,“老无所依”的状况便常常出现在如今的农村。如上种种,都是使得一个区域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增加的因由所在。另外,更为显著的是对于当地经济的某种程度的破坏。首先,几乎绝大多数青壮年会选择外出务工,这几乎成为一个潮流,而留守在农村的更多就是老人、小孩,还有一部分妇女。出走的人与留守的人之间往往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供需关系,前者每年定时往家里寄钱,后者每年便指望寄到家里来的钱过生活。如此往复,守在村里的这些人在慢慢失去自主创造经济效益的动力,而原本应是乡村经济收入主要来源的农业更是因为缺少劳动力投入而难以维持。再者,对于一些有望依靠丰富的旅游资源来发展经济、维护本地文化的村镇,也会因为缺乏年轻有活力与创造力的本地人的参与,而举步维艰。

笔者曾走访过安徽省黟县宏村镇的屏山村,对这个村子人们大多是以“小桥流水人家”来形容。相较于其他众多已被学者专家们赋予诸多笔墨的“江南村落”而

言,屏山所受到的关注度,无论从最为惯常的旅游开放的视角还是从学术探讨的层面,无疑都是少之又少,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然而这样一个皖南山里的村子,又有它十分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讨论价值。屏山村生存现貌的呈现以及由此所传达出来的讯息,正好说明了中国乡土文化变迁过程中所经历的尴尬与困境,以及寻求解决这一问题途径的必要性。

从农业生存与发展的角度来说,屏山最大的特色应是皖南重要的养蚕基地;从与乡土文化相关的文化内涵的角度讲,屏山又是积淀着深厚历史渊源,自古尊义重文,诗礼传家,人才辈出的地方。至今屏山村保存着光裕堂、成道堂等七座祠堂以及明清民居若干,即使是抛却探讨其文化资源的较高视角不说,而纯粹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通俗意义上它的“旅游资源”也是极为丰富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常理看来应富足而热闹的村子,现所呈现出的却是另一番面貌。

据言,屏山村自古有“三千烟灶,五里长街”之说,鼎盛时期全村有一千多口人、四百多户成套民居。笔者便是带着一种对于小桥流水炊烟人家的美好想象走进了这个村落。所见除了村口的贴墙牌坊上还留存有五彩斑驳的颜色,整个屏山的状态给人的感觉便是单调而萧索的灰色。少量的游客,偶尔能见的是从各个美术学院过来写生的学生(大部分集中在宏村),余下就是还“留守”在原地的屏山村民。他们白天在各自祖屋的偏厅待着(这些祖屋往往年代久远,有的又有建筑美学上的价值,因此正厅偶尔会有路过的游客进进出出),彼此少有交谈,更不懂得如何引导本就稀少的游客参观,仿佛外来的人在自家的屋子里进出是与己无关的事情。到要做饭的时候,就会在流过村子的水边见到这些老弱妇孺,也是大多沉默着,择菜洗菜。偶尔走过去试图搭讪聊天,更多的时候也都被或茫然或羞涩的沉默回应了。直到有一位村民告诉笔者,村子里的青壮年,能走的都走了,在外富裕了之后有的也把老婆孩子接走,鲜少再回来。老人们守着这一村子的木雕楼,很多时候也并不知道该如何与之相处。偶尔也能见到脑子相对活络大胆的村民,在自己堂屋里卖一些“工艺品”。所谓工艺品,是看上去破破烂烂的不知从哪里收来的东西,有的还并未见得有徽文化的特征。对于绝大多数留守的村民来说,“旅游资源”或许并未在他们的头脑中形成概念,再或许他们本身也并不完全明白自身所处的究竟是怎样一种“文化”,而只当是生活的常态。当然,也许“文化”本身即是被外人赋予的一个名词,与生活的本质并无必然相关,但如此的生存模式也一定不应是一个聚居地健康的状态。一切潜在的关于农业发展与文化生存的病态就这样毫无生气地静默下去,这不仅仅是屏山

村一个村庄所面临的问题，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乡村来说，更是尖锐的矛盾所在。

于是，关于乡土文化的变迁，笔者认为主要是在如下两个因素的作用下进行的：一是伴随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取代，导致乡土文化被逐步边缘化。现代社会的一个根本性特征，就是在经济发展中，工业和服务部门在重要性上取代了农业，“农业不再是主导的经济活动。”<sup>①</sup>这就导致了基于工业化大规模生产，注重货币转换的经济原则和消费欲望激发的城市文化对乡土文化的冲击。二是由于自中国改革以来一系列政策的制定推行，使得农民开始冲破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分割制度的束缚，而拓宽了生存的空间。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改革，改写了口粮分配、工分分配和户籍制度限制农民流动的历史。农民为了摆脱困顿的生活，也为了改变先赋性身份，而纷纷流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这就导致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离土又离乡”的乡土社会变局加速进行。改革后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的土地观念的根基，在传统的土地观念与商品意识的冲突碰撞中，农民不再满足于土地生产所带来的微薄收入，而是将眼光投向了市场，开始采用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生产工具促使自然农业向商品农业的转化。他们冲破了“农人之子恒为农”的传统观念束缚，不再守着有限的田地，而是离土、离乡，在农业之外开辟属于自己的新天地。正因为“乡—土—人”之间的离散趋势，导致了以“守土”为特征的乡土文化的变迁。这种变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利益原则挑战乡村社会固守的农耕传统。农业生产自古就是农耕民族赖以生存的资本。从生活的角度来看农业生产行为，可以称之为“农活”。在这过程中，有人与动植物之间的情感交流，有创造性劳作中对生活真谛的体悟。因此，农业劳动充满了一种“综合的人性”，其独特的教育作用有助于对“完整的人”的设计与培养。<sup>②</sup>然而，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那些没有经济价值或低产的品种被迅速淘汰，如何利用新技术脱贫致富、增加产量成为从事生产的终极追求。人们对科技的笃信与虔诚，使农事信仰对人的约束与规范日趋淡薄。对于老一辈的农民来说，祈求各种神灵护佑丰收的心理尚在，但在生产中也难以排除与一些禁忌相冲突的施肥用药，他们正徘徊在神灵与现代科技之间。对于年轻的一代来说，迫于生计的外出打工使他们丧失了原有与自然和农业亲密接触的机会，传统耕作制度中所蕴涵的生态文化观已远离了他们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业与城市夺走了传统农业与农村的活力，也在不断地重构着乡村的生活内容与节奏。

第二，高效化的现代农业种植方式对传统农业构成威胁。农业生产最直观的形式就是农耕技术和农具的使用。由于新培育的高产品种的推广，大多以充分的水肥条件和防治病虫害的农药为前提。这种单纯追求高产的做法不仅使环境遭受污染，害虫天敌死亡，农产品的质量降低，也使我国许多优良的生态农业传统走向衰落。比如，由于化肥和农药的使用，使珠江三角洲稻田和果蔬、水产轮作、混作、间套作的耕作制度消失，适合当地特殊条件的耕作方式“桑基鱼塘”和“蔗基鱼塘”基本上被淘汰；适应季节性缺水的许多水旱轮作、水肥轮作的耕作方式及其优良种植品种已消失。<sup>③</sup>而从农具的使用状况视之，那些代表一个时代一个地域农业发展最高水平的传统农具，正在被抽水机、除草机、收割机、打谷机等取代。作为传统农耕生活方式的历史记录，舂臼、桔槔、石磨等工具几近绝种，无工业污染和能源消耗的风车、水车技术在化学和电力“工具”的冲击中备受冷落。

第三，电视传媒以及各种以城市为中心的外来文化价值对乡村文化价值、生活秩序的冲击，对乡村沿袭风俗、“民德”和价值观念构成威胁。由于大批农民外出务工，乡村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节奏加快，原有的一整套与生产、生活节奏相配套的节庆仪式趋于式微。而且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带来了城市社会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乡村社会的生活观念和模式受到了冲击。比如，年俗活动大大简化甚至消失，年味也越来越淡了。传统的勤俭持家观念受到短视消费文化的刺激，农民手里的钱也基本不用于生产和积累上，而是大多用于攀比、浪费、甚至是赌博上。“原来的乡村文化秩序土崩瓦解。民歌、民间故事、民间曲艺逐渐从乡村消失，乃至绝迹，代际之间的乡村文化交流已经完全让位于对以金钱为中心的拜物教文化。”<sup>④</sup>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乡村的伦理秩序也在发生异化，传统的信任关系渐遭瓦解，邻里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而缺乏温情。

乡土观念是农村社会文化特点的核心，牵一发而动全身。缘于此，整个文化观念体系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礼制秩序和长老统治随着乡土社会的变局解体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取而代之的是自由民主、法治观念、市

① [美] 道格拉斯·C. 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87页。

② [日] 祖田修：《农学原论》，张玉林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0～155页。

③ 王献溥、于顺利等：《从传统农业的衰落谈农业遗产的继承与发展》，《安徽农业科学》2007年第8期。

④ 刘铁芳：《乡村的终结与乡村教育的文化缺失》，《书屋》2006年第10期。

市场经济意识、竞争开放意识逐渐被广大农民所认同。

### 三、乡土文化创新的动力与未来走向

关于乡土文化的未来走向,主要存在以下四种观点:“文化入侵论”、“文化终结论”、“文化现代化论”和“文化断裂论”。“文化入侵论”认为乡土文化必然被城市文化挤占。“文化终结论”认为现代文化的发展必然导致乡土文化的消失。“文化现代化论”则认为,乡土文化在保留自身优秀成分的同时,也会吸收城市文化的精华而进行乡土文化的现代化。同样,“文化断裂论”认为,因文化断裂本身是文化发展的常态,因此,乡土文化的发展也是一个由各环节链接成的“链条”,“断裂”是文化成长中的一环,“短时段”看“断裂”是“裂口”,“长时段”看则又是“接口”,由无序的“断裂”到有序的新环节,这个过程便是“断裂”的发展方向。“文化断裂论”和“文化现代化论”一样,都认为乡土文化与现代文化都有着开放性和向前发展的特性,因此是可以相互共存、依存和相互影响的。现代化对传统冲击的同时也催生传统的变革和发展。具体说来,乡土文化走向现代决不是完全颠覆传统这一本体而另起炉灶,只能是基于传统的现代转换,是在丰富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对原有文化习俗赋予新时代意义使其更适应现代人生活的需要的过程。<sup>①</sup>

综上观点,关于乡土文化未来的发展并未提出相关可行的措施,而要探寻乡土文化的未来走向,就必须切实找到乡土文化创新的动力所在。笔者认为,要实现乡土文化的创新,必须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乡土文化发展与乡土经济现代化的问题,而只有建立在一种代表新型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文化才具有真正创新的动力;二是乡土文化的发展必须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与此同时,必须明白,现代化建设不仅要注重人的物质生活的享受和消费欲望的满足,还须重视人的生活质量的提高。主要在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特别是人的“精神家园”的富足等等。

#### (一) 乡土文化创新的动力

中国是一个有着长期的自然经济历史的国家。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社会是以农业为主导的传统社会,农业是主导产业,农村是主要的活动区域,农民则是主体成员,这样农业文明生长起来的乡村文化就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考察乡土文化的变迁,必然不能脱离广大乡村文化的“动与静”。而观念形态的文化变迁,从来都是由器物形态的文化决定的。

#### 1. 农业的现代化是乡土文化创新的外在动力

马克思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sup>②</sup> 社会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的进步所导致的意识观念的变革是必然的。即使是历史上形成的十分强大的意识观念,在社会实践的推动下,随着物质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必然会发生变迁。因此说,现代化对乡村文化的挤压和冲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虽然有些学者认为,“当前乡土文化转化为经济价值的主要有三种形式:乡土文化产品、乡土文化景观、乡土文化经济活动。有些村镇开发利用乡村的自然景观、庙宇、乡民艺术、民俗风情等因素,发展旅游业;或开发利用各种民间工艺品开拓市场;或利用传统节日、庙会、地方名胜古迹等,兴办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乡土文化艺术节;或者组织各种乡村文化活动:文化表演、竞赛等,并借此机会开展经济交流和招商引资等活动,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兴旺。”<sup>③</sup> 但是纯粹搞旅游开发并没有真正解决乡村经济的现代化问题,因为乡土文化以各种“符号化”再现的形式成为乡土文化商业化的载体,不是对乡土文化的真正重构,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乡土文化的虚拟再现。因此,乡土文化的创新必须立足于农业的现代化。

农业是弱势产业已是公认的事实。但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农业的弱势?也就是说,农业的弱势产业是产业自然分工的结果,还是人为制度导致的呢?在认识任何一件事情或一个事物的产生上,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是社会实在论,一是社会建构论。前者认为事情或事件的产生是社会本身自然而然生长的结果,而不是社会的主观建构和制度的人为设定的结果;后者,反之。如果从社会实在论的角度看,必然认为农业作为弱势产业的产生是产业自然分工的结果。如果从社会建构论的角度看,必定认为农业作为弱势产业是社会建构或制度人为设定的结果。就农产品而言,一般认为,农产品的需求弹性少,是由农产品的性质决定的,因为对农产品的需求主要是由人的自然生理决定的,而人的生理满足是会饱和的。由此推论,农业的弱势便是产业自然分工的结果。但笔者认为,农产品之所以需求弹性少,更主要的原因或是由于农产品没有随着社会转型的变化而改变其用途所造成。因为,伴随着社会由生产者社会转变为消费社会以来,社会的消费动力主要不再是停留

① 黄文彩:《乡土文化的“断裂”及其合理走向》,《柳州师专学报》2009年第3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

③ 刘春兰:《新农村建设中乡土文化的价值开发与制度引导》,《理论界》2008年第6期。

在对人的生理的满足上。正如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说：人总是在“不消费”一些他们必然获得的一些要素的同时“消费”一些他们不自然获得的消费物；而在消费社会中，被文化化的越来越多，自然的越来越少，在被文化化的生活环境下，往往人们“消费”的要比“不消费”的多得多。这说明，通过农产品的深加工，以激发和增加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量，不仅必要，而且可能。于此，未来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进程，不仅是做强我国农业的根本途径，也是实现中国乡土文化创新的动力所在。而就整个乡村而言，还可以通过对乡村风景进行开发，通过自然风光来进行旅游开发，以增加农业效应。以欧美国家的乡村建设为例，其主要经验有：一是通过对农产品进行各种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条，使农业向工业、甚至第三产业延伸；二是除对农产品的深加工外，还对农村的风景进行开发；三是遵循农业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发展特色，以农村社区为单位，实行对各种乡村资源的循环运用。欧美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经验告诉我们，农业的现代化不仅仅是农业的工业化，不能照搬工业现代化的途径，而应该通过整个系统的运作来解决农业现代化问题。

就现代化与乡土文化的内在关系而言，有学者认为：由于现代化是以工业化为基础，以城市为区域基础，以城市市民为社会主体的，这就造成了农村传统地位的陷落和“三农”问题的凸现，也造成了乡村文化的危机和“边缘化”。<sup>①</sup>但是，传统农业和农民并非是现代的对立面，并不是非要消灭传统农业和农民才可能发展现代化，我国自1990年代开始愈演愈烈的“三农问题”产生的深层根源，恰恰是由于受城市“主体”、市民“主体”理念的支配，一直将推进现代化的重心定位在“农村的城市化、农民的市民化”上的结果。综上所述，尽管是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基本一致的，这就是伴随着现代化实践的推进，必然导致乡土文化的变迁。经验表明，乡土文化的变迁不仅不会是乡土文化发展的危机，相反，在乡土文化的发展中孕育着创新的动机。农业的现代化正是乡土文化创新的重要动力。

## 2. “精神家园”的复兴是乡土文化创新的内在动力

“对任何现实的理解与认识，都有它无法摆脱的先行结构，这就是传统”。<sup>②</sup>乡土文化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寄托与信仰表达的文化母体。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乡土文化强调一种公共性和人伦性；在人与物的关系上，乡土文化则强调人与外界的和睦共处。因此，乡土文化是自有其存在价值的独立系统，它是乡村共同体内的一个“精神家园”，人们从这个“镜像”里可以看到自己本来的身影，并引发关于自身来自何方的遥远的回忆。正是在这种有

着某种天人合一旨趣的文化生态之中，乡村表现出自然、淳朴而独到的文化品格。<sup>③</sup>梁漱溟先生也曾强调，中国文化的根在乡村，“新中国的嫩芽必须从旧中国的老根——乡村——中长出来”，中国要复兴的前提是乡村文化的复苏，而其最重者在于农民的精神重建。<sup>④</sup>所以说，乡村文化不仅是现代化乡村建设的灵魂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以耕读文化为代表的乡村文化与以庙堂文化为代表的城市文化是相互统一的，儒家文化是两者的内在精神支柱。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耕读传家是通往庙堂的途径，而归隐山野是庙堂不得意后的退路。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伦理秩序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传统乡村文化，与注重天人合一、伦理道德的庙堂文化是统一的，因此，传统社会的乡村建设旨在以儒家思想来整治以“农”为本的乡村社会秩序。只是后来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大门之后，在一些以社会医生自居的“救国图强”人士眼里，乡村便成了愚昧、落后、闭塞的代名词，而乡村的主体——农民，则被表述为古老中华文化劣根性的代表，也是国民性改造的首要对象。正是在近代中国非自发性的现代化过程中，在民族救亡的时代背景下，乡村文化一次又一次地被作为现代城市文化的对立面，成了完全被改造的对象，乡村逐渐失去其话语权。在“五四”运动矫枉过正的激进主义思维的指导下，传统乡村文化成了批判的对象，在“科学”、“民主”等现代政治文明话语的表述中，民间习俗、宗族传统、道德观念等都被定义为“迷信”，与现代化进程不符。乡村文化逐渐沦为现代城市文化的附庸，两者之间的渗透、改造也由双向变为单向。有学者因此指出，自新中国建立后，不管是乡村建设派，还是乡村学院派依然没有脱离“五四”运动以来城市乡村单向改造的总体认知。<sup>⑤</sup>乡村成了“革命”的继续与深化，乡村文化也成了现代“革命文化”的载体之一。而农民自身的表达和需要却被忽视。

① 徐勇：《在现代化视野中看“三农问题”》，《南方日报》2005年10月28日。

② 方李莉：《文化自觉与“全球化”发展》，《文化研究》2007年第1期。

③ 解松：《乡村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④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120页。

⑤ 赵旭东：《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围绕“晏阳初模式”的知识社会学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同时,正如马克思所说:现代生产方式依凭对生产力的重要贡献在确立了它的历史地位的同时,也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sup>①</sup>生活在都市里的人们在享受着现代生产方式带来的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却也陷入到钢筋水泥和机械电子的重重包围之中,常常感到莫名的空虚和烦恼。“城市工业界的影响使得新的稀有之物出现:空间和时间、纯洁空气、绿色、水、宁静……一些过去无需花钱唾手可得的财富却变成了惟有特权者才能享用的奢侈品。”<sup>②</sup>于是,长期被拒斥为一种边缘的、非主流的生活模式和文化类型的乡村,逐渐成为生活在现代社会浮躁的氛围之中的人们排解矛盾和焦虑的“心灵家园”。不管是现代社会中的成功者还是失败者,都可以在乡村宁谧的环境和古朴的文化中,获得抚慰疲惫心灵的机会。在现代消费文化体系中,乡村文化资源成了传统、原生态、原滋原味等意境的代名词。现代社会在提供乡村文化产品的价值转化机制的同时,也赋予了乡村文化资源的新的价值评判体系。乡土文化“既可以表现出物质性的一面,也可以表现为符号性的一面”,<sup>③</sup>并由此而获得多重的价值形式。此外,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对经济发展观的盲目推崇,导致了許多社会问题,如人们文化的贫困、道德素质的下降、精神生活的缺乏等等,这使得这些国家开始重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开始寻找“失去的根”,试图重新挖掘传统文化之精髓,重建文化本土之内涵。在中国发展中面临人性的迷失即理性的缺失,同样已成为乡村文化重建的核心问题。于是,一些有识人士开始用行动重建乡村的伦理、信任,以及生活方式,旨在再造理想乡土家园的各种新的“乡村实验”已不声不响地在进行,并开始显示出其重要的示范性与影响力。

不仅如此,历史也表明,两种异质文化交流时,往往容易出现“涵化”,即两个以上不同文化体系间由于持续接触和影响而造成的一方或双方发生的大规模的文化变迁,是一种文化从其他文化中获得对新的生活条件的适应过程,是在过程中的文化交流、传递和整合。“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观点,它指人要对自已所在的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文化的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是文化的一种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行为。乡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相遇,对于“涵化”后可能会出现“同化”、“整合”、“混合”、“分化”和“边缘化”等现象,“文化自觉”必定使乡土文化选择“整合”之路,最终实现重构。而作为一个动态存在的文化实体,乡土文化与现代文化必须经历一个混杂冲突、此消彼长、相互渗透、相互学习、相互转化的状态。从长远看,乡土文化会随着它所依存的环境,包

括自然与社会、人文生态环境的变迁,而在内驱力的作用下发生缓慢的变化,必然经历嬗变,最后重构融合了现代文化的新乡土文化。

## (二) 乡土文化的未来走向

综观一些已经成功实现乡村现代化的国家或地区的经验,农村的现代化无疑将是享有现代化技术设备、物质设施的,但是具有自身文化特色,且保持良好自然风貌的社区。机械化的劳动方式、城市化的衣食住行、现代文化、闲暇生活等,都与城市没有本质区别;但同时,这些乡村社会大都仍保留着有别于城市的、特有的自然景观或田园风光、传统的文化习俗以及价值观念。如英国的乡村田园风光和生活情调就是很典型的,尽管乡村已经具备了现代化的生活设施和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但是,从喧闹、拥挤和节奏紧张的城市到乡村去,看到绿色的田野中放牧的牛羊,蓝天白云下式样别致的农舍,清新的空气和淳朴好客的农民,你会感觉到城乡鲜明的对比。同样,如中国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晋江模式,以及类似于“肥西小团山香草园”的各式生态农庄等,无论是工业型村落还是发达的农业型村落,都越来越显示了这种发展趋势。

因此,对于中国今后乡村现代化发展的方向,不妨做以下设想:伴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农业将成为众多产业中的一种,同样,农民将成为众多职业分工中的一种。农民由于掌握了现代知识和技术,在农业中能够充分实现个体价值而大有所为,从而能够将乡村建设成为拥有现代化便利生活并具有自身文化特色和天然环境的社区。乡村将告别传统的村落形态,“互识的社会,角色的混淆,低水平的劳动分工和高度的自身消费”,这些传统农业文明特征的消失将带来价值体系和社会关系图式的根本变化。“这些变化将按照自身的逻辑展开,直到重新组成新的体系和新的图式”。<sup>④</sup>新的乡村生活方式因其自然环境优于城市而更具吸引力,“以致城市人一旦有可能就从城市溜走,以便到乡村和小城市里去重新找回城市的乐趣,仿佛只有这一点才赋予生活一点意义。”<sup>⑤</sup>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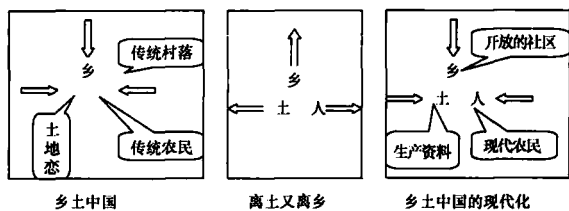
② [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5页。

③ 薛晓源、曹荣湘主编《全球化与文化资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90页。

④ [法]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67页。

⑤ 同上书,第282页。

图1 乡土文化的未来走向



如上图所示，中国的乡土文化在经过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之后，“乡、土、人”三者又会重新以新的结构形式聚在一起而形成新的乡土文化。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可以设想，随着“守土”的逐步瓦解，中国乡土文化将日渐出现新的发展。“守土”的逐步瓦解主要反映在：第一，传统乡村地域的封闭性被打破了，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入乡村，体验当地的田园风光与生活情趣，乡村逐步走向开放；第二，传统的熟人社会逐渐为陌生人社会所取代，不同地区、民族甚至国家的游客开始走进了乡村，逐渐形成了新的乡村社会，农村不再是以前的“一村唯两姓”，“生者不远别、嫁娶选近邻”的状态。人们虽依然对土地保持着深厚的情感，但固守土地形成的“土地恋”将会日渐消退，土地仅仅被作为一种资本或生产资料，“能够被农业劳动者、政府和资本家仅仅视为一项生产要素。”

香港著名社会学家金耀基先生认为：“中国的现代化目标是构建一个新的文明秩序，他不可能没有启蒙的因素，但无需并且没有可能是启蒙整套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建设中国现代性部分的资源应该并且必须来自中国这个‘轴心期文明’的文化传统。”<sup>①</sup>因此，中国

的乡土文化的发展不是故步自封的静态过程，而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过程。而由于乡土文化是中华炎黄子孙的“精神家园”，与现代文化注重人生活质量和个体素质的提高是相契合的，这就决定人们会主动对乡土文化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向进行反思，对文化发展的总规律进行探讨，主动了解和吸收现代文明的先进文化成分，着力弘扬它契合时代的智慧，并自觉地热爱和参与乡土文化，自愿地去保持和发展传统乡土文化的特性，以实现乡土的“文化自觉”。因此，从总体上讲，中国乡土文化的创新，应该注重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注重中西文化的结合，同时与“每个乡村社会”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中保持“乡土特质”，于中西文化的融合中体现“中国特色”，通过因地制宜突出“地域特点”，方能达到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自觉”的目的。中国乡土文化的创新与重建，必将为中国的乡村发展提供最根本和可持续的内驱动力。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建设思想的演进 07BDJ003”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马光

① 金耀基：《论中国的现代化与现性——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 On the Transition of Homeland Culture

Hu Yinglan

**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homeland culture was born with the interaction of “home, land and people” (*xiang, tu, ren*), which wer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land securing” (*shou tu*) in the text of Chinese tradition. With the advent of speeding-up advance embodied in Chinese rural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the close link between “home, land and people” began to disintegrate where people begin to leave home as well as land, resulting to the transition of the homeland culture. However, this transition not necessarily predicted the crisis of homeland culture as the development of homeland culture contained impetus and mechanism of innovation, among which the modernization of *Sannong* issues (three critical agri-issues: agriculture, rural community and farmers) acted as the external impetus of the innovation of homeland culture, and the revival of spiritual homeland served as the inner dynamic. Based on the revitalizing or blooming the root of Chinese culture, the future trend of homeland culture should emphasize on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raditional/modern and the oriental/western, so as to achieve a cultural consciousness which on the one hand showed the respect to different cultures,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made the best use of advantages of them to forge a harmonious world.

**Key words:** homeland culture; transition; innovation; cultural consciousness